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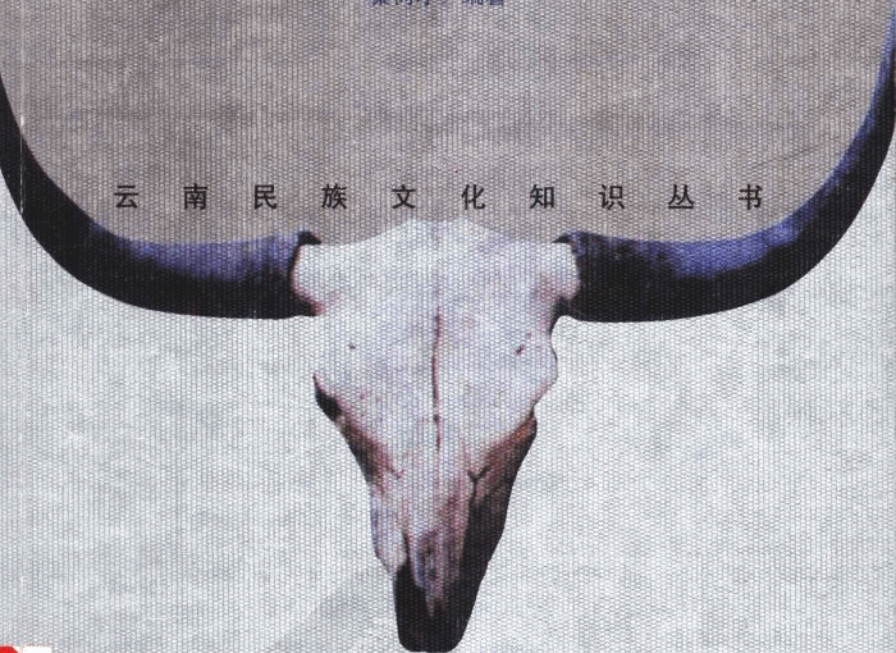


云岭金江话货殖

——云南民族商贸

秦树才 / 编著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总序

——
王天玺

展望21世纪,文化智力优势必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优势,文化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的民族凝聚功能和鼓舞力量会更加突出,文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就是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表现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把先进文化的种子撒遍滇山云水,并使之在红土高原上开花结果;用先进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用先进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用先进文化塑造民族精神,提高全省人民的素质;倡导、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 and 精神;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先进文化的建设既是远大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传播文化、普及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云南出版界有关云南民族文化著作的出版蔚为大观,成系列的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云南丛书”,包含《云南简史》、《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文物古迹》等十多种;90年代末,云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云南物质文化》

系列《农耕卷》、《生活技术卷》、《纺织卷》、《采集渔猎卷》等图文并茂的学术著作；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云南省5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立卷”，每个民族单独一卷，现已出版近十种。此外，从各个层面研究云南民族文化的单本著作也已出版了千余种。这些著作各有特点，无不为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播和普及作出贡献。但是，至今我们尚未看到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且深入浅出地介绍云南民族文化的出版物，使我们在深入研究、广泛传播、全面普及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缺少必要的参考书和教材。因此，为更好地配合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宣传，我们组织专家学者编辑出版这套“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

云南各民族人民在千百年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优秀的文化，涵养了高尚的道德，培育了进取的精神。本丛书力图深入研究我省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文精神，建立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两大支点的崇尚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亲和力、融合力、凝聚力，不断提高自尊、自信、自立、自主的民族精神。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遵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弘扬云南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把云南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推向全社会，为深入研究云南民族文化提供参考，为提高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提供教材，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添砖加瓦。

本丛书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原则指导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方针。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者、领导者在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学术气氛中，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人民的广阔胸襟，以勇于开拓、勇于创造的全新精神，以为云南各族人民负责的社会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较好地完成了写作、编辑、出版工作。

民族文化丛书的不少课题前人已有研究，并有研究成果刊布。我们的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每本书都将主要参考文献列出，以示对前人辛勤劳动的尊重和谢忱。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是我们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献上的一块砖一片瓦。愿我们的粗砖薄瓦，会引来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所需的栋梁大柱和宝玉珍珠。

我们坚信，当民族文化知识在红土高原全面普及的时候，距离建成民族文化大省的路途就已不再遥远。

目 录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总序	—— 王天玺	1
前言		1
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3
秦以前——蹒跚起步		3
两汉——朝霞满天		7
三国两晋南北朝——乍暖还寒		20
唐宋——姹紫嫣红又一春		24
元明清——金秋飘香		37
近代——转型的喜悦与悲哀		60
斑斓多彩的商贸画卷		89
物华天宝商品多		89
丰富多样的市场类型		98
别具魅力的商贸方式		117
含着壮大的云南民族商人		129
多姿多彩的货币		138
绚丽的商贸文化		148
主要参考文献		166
后记		168



前 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原始社会后期,即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云南出现了早期的商品贸易。此后,虽经历曲折,云南民族商贸仍日渐发展起来,成为云南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云南民族商贸又对丰富云南各族人民生活,促进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云南各族人民之间、云南各族人民与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之间的联系,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云南是祖国内地联系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桥梁和枢纽,云南民族商贸又对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云南民族商贸活动中,还积淀、发展了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云南民族商贸文化,成为云南民族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因此,对云南民族商贸的认识是了解云南各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历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今天加强云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云南的开放和开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云南民族商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对外贸易方面,尚未对云南民族商贸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未出版旨在帮助人们了解

云南民族商贸基本情况的通俗读物。这种状况自然有碍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建设，不利于云南的改革开放。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搜集史料，力图较全面、系统地对云南民族商贸作一番通俗的介绍，以增进人们对云南的认识和了解。

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在原始社会后期，即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及以制陶、纺织为中心的手工业，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上不但出现了可用以交换的剩余产品，为商品交换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还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位——氏族及其从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家族和个体家庭，从而使交换成为必要，初期的商品交换便产生了。

大约距今三四千年前，云南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尽管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有特点，但从总体上看，当时云南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考古发掘情况看，云

南以稻作为主的定居原始农业达到了相当水平，制陶、纺织、家畜饲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虽然这些行业的生产者难以独立于其他行业之外，但是行业倾向的存在则是无可置疑的。尤其如制陶这样技术性较强的行业，虽然制陶者并非不从事其他农副业生产，但也并非社会上人人都能制陶，社会上必然存在一些以制陶为主要社会职业的氏族、家族或个体家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强，云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剩余产品。在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现了用以储存剩余物的窖穴，在一些窖穴里，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炭化粳稻。在元谋大墩子的19座成人墓穴中，有18个墓主遗骸均表现出不同程度地被箭簇射中的迹象，说明当时为争夺剩余财富而进行的战争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剩余物的存在以及不同氏族、家族或个体家庭等经济

利益单位的存在，必然要导致不同利益单位之间以生产、生活用品为主要交换内容的交换活动的产生。云南的商品贸易活动也就蹒跚起步了。

云南早期的商品交换活动较多地表现为不同氏族、家族、家庭间偶而发生的产品交换。云南地理环境复杂，既有90%以上的宜牧山区，又有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的宜农坝区，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世代居住在云南的各土著居民适应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发展起了多种多样的经济类型。新石器时代，我国西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氏羌居民、东南沿海地区以农耕和渔业著称的百越居民不断迁入云南，进一步强化了云南各部落、各地域间经济的差异性，形成滇池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洱海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南地区的平坝地区以稻作农业为主，而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滇西北地区以

及云南省广大山区、半山区以畜牧业为主的不同经济类型。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云南各地各民族间交换活动的发生。此外，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云南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氏羌居民、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居民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中自然应该包括商品交易活动。

在昭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五件铜制品，说明云南当时已经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而距今3100年前的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又正式拉开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序幕。在公元前109年西汉在云南设置郡县前，云南的青铜文化便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云南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滇西洱海地区、滇池地区的锄耕农业、青铜冶炼和铸造业工艺较为发达，可用于进行交换的剩余产品更为丰富。与

此同时，云南各地区间、云南与祖国内地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些都为云南民族商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云南的民族商贸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是出现了集市的雏形——以祭祀等社会集会活动为契机的商品交换活动。在晋宁石寨山第一号墓和第十二号墓中，各出土了一件祭祀贮贝器，在贮贝器盖的雕铸中，有从事交易活动的人物造型（图1）。二是形成了较多的商品种类。既有粮食、瓜果、蔬菜、鱼、牛、羊、虎、豹、孔雀等，又有以海贝、丝绸、铜镜、粉黛、胭脂、琉璃珠、蚀花石髓珠、带钩、弩机等化妆品和铁制武器为主的外地输入品，还有以铜、铅等金属占主导的本地输出品。三是云南对外商品交易通道基本成形。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向北，经邛都（今四川省凉山州）、笮都（今四川雅安地区），或经滇东北，再由沿岷江开凿的焚道，可到达蜀地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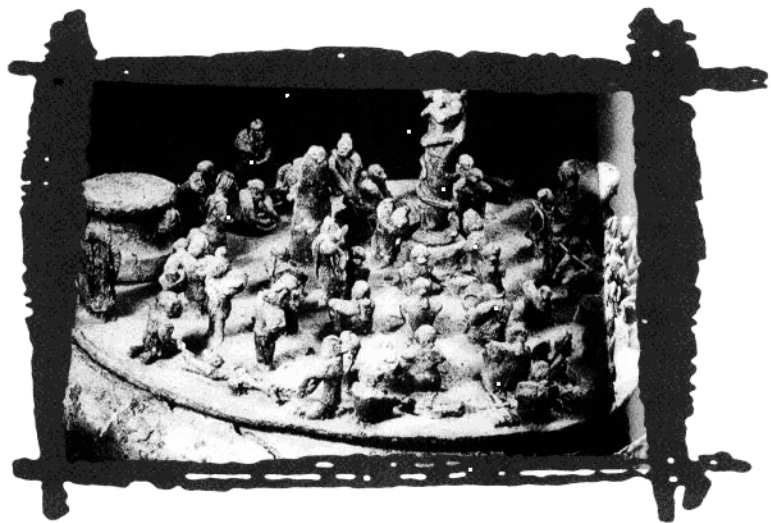


图1 祭祀贮贝器上反映出的滇池地区早期商品交易

都；向东，可经夜郎地区（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再顺延水（今乌江）入长江，到达楚国；向东南，可经句町（今云南广南县）、进桑（今云南河口县），入交趾（今越南北部）和两广；向西，可经昆明（今洱海地区）、雋唐（今保山），到达掸人居住地区（今缅甸北部）和身毒（今印度）。其中由楚、蜀经云南到印度的商路，为我国著名的国际商路，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中国的丝织品、印度的琉璃珠等物品都由这一路线贩运。这一切为起步时期的云南商贸活动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两汉——朝霞满天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军队降服夜郎，

设立牂牁郡，统治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地区。接着，又降服邛、笮，设立越嵩、武都二郡，其中越相当于今四川省凉山州和云南省丽江、楚雄部分地区。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设益州郡，统治今昆明、楚雄、大理、曲靖西部、玉溪、红河等地。东汉又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立永昌郡，统治今大理、保山、德宏、临沧和西双版纳西部等地区。至此，云南绝大部分地区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两汉对云南的政治统治，对云南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一，郑纯任益州西部蜀国都尉和永昌郡太守，文齐、景毅任益州郡太守时，都在所属地区推行了一些稳定地方政权、发展经济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二，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两汉王朝又从内地向云南派遣地方官员和军队（即郡兵），还把一些奸豪和犯了死

罪的人遣发云南，从而形成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的第一次高潮。这些汉族移民不但是云南的直接开发者，而且还为云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铁农具、牛耕、水利灌溉三项主要农业技术在东汉初期就传入了云南。其三，政治上的统治和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本身即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而两汉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又修筑了通往云南的道路。在民间商路的基础上正式修筑了南夷道、西夷道、博南道等，大大改善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密切了云南各地间的联系，非常有利于商品贸易。其四，两汉在云南设置的各郡县治所是云南各地经济、文化的中心，客观上也成为各地的商品交易中心。各地治所间联系的逐步建立和加强，又初步形成了云南各地相互联系的网络，便利了地区间的商品交易。这一切，最终带来了两汉时期云南民族商贸的

初步兴盛。

两汉时期，云南民族商贸的初步兴盛首先体现在云南各地商品交易中心的形成上。在此以前，云南有限的商品交易一般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稍有规模的交易主要是利用祭祀等社会活动进行。两汉在云南设郡县后，各郡县都建立了治所。虽然各治所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然而由于治所一般设在自然条件较好、经济较发达、交通较方便的地方，又集聚了很多人口，有一定的城镇设施，所以各治所便自然地成为所在区域的商品交易中心。到东汉设立永昌郡后，云南郡县治所达到了40个，使云南有史以来第一次普遍形成了范围较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中心相互关联，基本构成了云南各地的商品交易网络。其中，益州郡治滇池县（今晋宁）、永昌郡治唐县（今保山），以及滇东北的朱提县（今昭通），还成为整个云南交

通和商品交易的中心。

两汉时期，云南商业通道的条件进一步改善。秦以前，内地经由云南联系印度、东南亚的商路已经形成。后经战国至两汉时期的不断经营，这些原始商道进一步通畅。战国时期，秦国由李冰父子沿岷江修筑由蜀通往樊道（今宜宾）的道路，史称“樊道”。秦朝又派常頌接樊道修筑通往云南的五尽道，经石门关（今盐津县豆沙关）、朱提通往曲靖、昆明。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招降夜郎设县后，又征发巴蜀士卒开筑由樊道经滇东北到夜郎地区的“南夷道”。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招降邛、笮等部后，又修筑了由蜀经邛、笮（今四川雅安地区、凉山州）进入云南的“西夷道”。修路的同时，又于道路沿线设置邮亭馆所，负责为过往官差和“行旅”提供食宿方便。张骞出使西域后，打听到由蜀经云

南、缅甸北部地区可到达身毒（印度），再向北可进入西域，汉武帝便派四批使者由蜀出发，探求这条道路，对道路沿线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坚定了经营云南的决心。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在云南设立郡县后，蜀一身毒道经过的大部分地区因纳入汉王朝版图而大为通畅。不但如此，西汉又以犒唐（今保山）、不韦（今施甸）为基地，修筑由洱海地区通往哀牢地区的“博南道”（图2），大大改善了蜀一身毒道中这一最为险要的路段，保障了蜀一身毒道的畅通。这些做法使蜀一身毒道等国际商路由民间窃出之路变为受国家高度重视的国际商道，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部分路段的修筑及社会环境的改善，又大大改变了该路的状况，方便了商旅，使这一条道路成为当时途经云南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商路。

两汉时期，云南形成了多



图2 盘绕山间的博南古道

层次的商品交易。最低层次的是云南境内各地居民之间为生产、生活所需而进行的商品交易。这时云南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除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纺织业的存在和发展外，以青铜制造为主的冶金业也蓬勃发展，奠定了商品交易发展的基础。因此，云南各民族用于交易的商品，除一般的生活、生产用品和各地土特产品外，尤以青铜器最为突出。锄、铤、斧、镰、锯等青铜农具和工具，釜、洗、勺、匕、尊、杯、镜、扣饰、牌饰、针线筒、绕线板等生活用品以及众多的武器、乐器、礼器等，已相当普遍。由于这些产品须经矿石开采、冶炼、青铜的合成及器物的浇铸、加工、打磨等多种工序才能生产出来，且生产技术要求较高，除必须掌握纯熟的范模制作技术外，还要使用当时在全国尚属先进的失蜡法技术、镏金技术以及镀

银、错金银、镶嵌、铸（线）刻等技术，~~可算技术种类多~~而且复杂，所以并非家庭手工所能完成。因此，这些产品必然要通过交易，从专业生产者手中流入民间。另外，盐作为日常生活用品为家家户户所需要，但其生产集中于连然（即安宁）等盐区，因此也必须通过交换，由生产者手中流通到消费者手中。这些都表明两汉时云南已普遍存在各族人民之间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换活动。

两汉时期，云南的金属采掘和冶炼（尤其是铜、铅、锡的采冶），以及各种金属制品的生产、加工已较内地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俞元县（今澄江、江川一带）出铜，律高县（今通海一带）出锡、银、铅，贵古（今蒙自、个旧一带）出铜、锡、银、铅，双柏县（今双柏、易门一带）出银，朱提（今昭通）、堂狼（今会泽、巧家一带）出产银、铜、铅等金属。滇池、

滇东北、洱海等地区已成为重要的青铜冶铸地，且生产、加工技术高超，产品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多，产品远销内地。早在商周时期，云南出产的铜、铅等金属即销往中原地区，成为当地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原料。两汉时期，云南销往内地的铜制品已经很多。在四川、贵州等地都出土了云南生产的青铜器，其中朱提、堂狼生产的铜洗更是远销中原各地。目前，在陕西、山东、四川、浙江、湖北等地均发现了产于云南的洗。据统计，我国传世和考古发现的铜洗中，属于云南朱提、堂狼生产的多达76件，占全国所见同类器物的五分之一以上，在有产地铭文的东汉铜器中遥遥领先，说明朱提堂狼洗在当时全国同类产品中销量很大(图3)。此外，云南银的生产也很有名，尤其是朱提出产的银，质量最高，成色最好，为第一流的银产品，大量输往内地，用作货币。云南畜

牧业也较为发达，滇西洱海地区的昆明人“随畜迁徙”，以游牧为主，其牲畜产量较高，以至于当他们的反抗被汉统治者镇压后，汉王朝掳走当地的牛、羊、马多达十多万头。汉代巴蜀很多商贾深入云南等“西南夷”地区购买笨马、牦牛等牲畜销往四川，获利丰厚。西汉时期，云南尚不能冶铁，但铁又是制作生产工具、武器的优良原料，故四川等地的商人多冶炼生铁，销售到云南滇池等地。最著名的就是蜀商卓王孙和程郑二人，他们都在四川临邛等铁矿产地冶炼，将铁和铁制品大量销往云南，结果都成巨富。在云南昭通等地出土的刻有“蜀郡成都”或“蜀郡”字样的铁锄等器物，说明当时确实有许多四川出产的铁器运销云南(图4)。此外，内地制作的铜镜、弩机等汉式器物也运销云南。这些汉式器物的流入量很大，较大程



图3 东汉时期云南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铜洗
(底部及侧面图)